

以传承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三重向度

□ 赵雅雅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是文化自信的根基与源泉。贵州民族文化底蕴深厚、特色鲜明,是中华文化的璀璨瑰宝。推动贵州民族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大力传承弘扬民族文化,是增强全省各族群众文化自信的重要途径。

一、构建系统性传承弘扬体系,夯实文化自信根基

构建系统性传承弘扬体系,是守护贵州民族文化根脉,筑牢文化根基的重要举措。这一体系需要从制度保障、人才建设、传承模式创新等三方面协同发力。

首先,制度保障是传承弘扬体系的核心支撑。通过出台《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和条例》《贵州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促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积极开展民族文化原生地保护工作,挖掘、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在实现文化遗产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居环境治理的综合整治的同时,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其次,人才建设是体系运转的关键动力。以培养、引进和激励为抓手,构建多层次、全链条的人才发展格局。一方面,通过分层分类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培育具备专业知识、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与拥有创新设计理念与现代工艺知识的民间艺人。另一方面,引进民族研究领域的高端人才与数字技术人才,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提供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完善人才激励与保障机

制,通过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方式,提高人才积极性。

再次,传承模式创新是体系发展的活力源泉。通过构建政府与市场相配合的协同模式,整合民族文化资源,使文化传承保护工作由政府“独唱”走向社会“合唱”,不仅能提高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工作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更能通过多方参与,凝聚中华文化认同,为提升文化自信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与实践根基。

二、推动民族文化与现代产业创新融合,激发文化自信活力

推动贵州民族文化与现代产业的创新融合,是激发文化自信活力的重要路径。贵州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为产业创新提供了深厚土壤,现代产业发展为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二者相辅相成。

一方面,通过文旅体融合,充分激发民族文化发展活力。贵州依托民族传统体育、节庆文化与生态资源,将文化体验、旅游观光与体育赛事有机结合为独具特色的融合发展模式,打造沉浸式文旅体融合新体验。“村超”“村BA”“村马”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成功接轨,强势“出圈”,在拉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展现侗族大歌、芦笙舞等文化符号,让本地村民与游客在欢呼呐喊中接受民族文化浸润,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

另一方面,文创周边产业为民族文化提供新的发展方向。通过文化与艺术的碰撞,将西江千户苗寨、肇兴侗寨与苗族银饰纹样、

蜡染技术等抽象化符号具体化为冰箱贴、吉祥物、发饰等具象文创产品,成为文旅体融合的新亮点,带动新的消费热潮。文创产品通过带动增收,让人们在经济收益中切实感受文化价值。此外,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蕴含着文化基因与精神脉络,通过创新设计,将贵州丰富的民族美学与民俗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证明民族文化的时代价值,提升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豪感。

三、打造立体化传播矩阵,展现文明贵州新风采

打造立体化传播矩阵,是贵州民族文化展现文明贵州新风采的重要途径。通过传统媒体、新媒体与线下场景的三维重构,推动贵州民族文化从保护走向自信输出。

首先,在传统媒体领域,依托省级卫视、报刊等平台,打造、推出深度民族文化节目。例如,贵州省委宣传部打造的贵州国际传播旗舰品牌《听 这里是贵州》,以纪录片的形式,讲述苗族飞歌、侗族大歌背后的历史故事。《非遗正青春》节目以“以青春之声,传递非遗之美”为宗旨,聚焦银饰锻造、蜡染制作等技艺,系统性展现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权威性与专业性的加持下,通过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艺术的形式,筑牢文化传播根基。

其次,新媒体平台则为贵州民族文化提供裂变式传播的沃土。短视频平台的官方账号与个人账号通过差异化定位与协同联动,实现权威引领与民间活力的双轨传播,通过视频制作与话题挑战赛、直播带货的方式,拓宽公众了解贵州民族文化的渠道,扩大其传

播范围,提升影响力。让人们充分感受贵州民族文化的魅力,实现从传播到认同的深层次跨越。

最后,将线下场景打造为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贵州依托“村超”“村BA”等乡村体育赛事活动,在开幕式与中场休息时融入贵州特色民族乐器演奏与舞蹈;在传统民族村寨建筑中常态化地开展民族歌舞演出与非遗传艺体验活动,打造贵州民族文化的鲜明形象,让游客在互动中充分感受文化魅力。立体化传播矩阵的构建,将民族文化以多元姿态展现出来,使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不断加深,自豪感也随之提升。

贵州在民族文化的传承弘扬征程中,以系统性保护传承体系守护文化根脉,用产业创新融合激发文化活力,借立体化传播矩阵展现文明贵州新风采,每一步实践都为文化自信注入强劲动能。从法规护航、人才培养,到“村超”“村BA”的火爆“出圈”,再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协同发力,贵州不仅让民族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更让文化自信深深扎根于群众心中。展望未来,贵州将持续深耕民族文化领域,不断探索创新,以更丰富的形式、更广阔的平台,让贵州民族文化走向全国、迈向世界,为增强中华文化自信贡献更多贵州力量。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贵州省2024年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两个结合”推动“四大文化工程”建设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4YJSKYJJ180)的阶段性成果。】

从“村BA”看乡村社会治理的方法论意蕴

□ 邵文霖

近年来,“村BA”从乡村田野走向全国视野,以全民参与的体育热情与浓郁的乡土文化魅力引发广泛关注。这场现象级赛事不仅是文化传承与乡村社会结构的生动缩影,也深刻考验着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同时更为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新契机。

一、“村BA”现象的多维剖析

文化传承与认同的具象场域。文化是维系民族或群体凝聚力的精神纽带,文化传承与认同对群体发展至关重要。“村BA”深深扎根于乡村本土文化,许多赛事与当地传统节日、民俗活动紧密交织。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盘乡为例,其“村BA”作为苗族“吃新节”的重要庆祝形式,已持续举办数十年。赛事中,苗族芦笙舞、侗族大歌等民族文化表演穿插其间,拉拉队身着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助威,颁奖仪式上的香米、麻鸭等特色奖品更是农耕文化的具象呈现。这种将现代体育竞技与民族文化深度融合的模式,不仅让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强化了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感,更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互鉴,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注入活力。

乡村社会结构的动态映射。乡村社会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独特而稳定的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网络。“村BA”赛事的组织与参与,生动反映了乡村社会结构的特质。参赛队伍多以村落、家族为单位组建,鲜明体现出血缘与地缘关系在乡村社会中的紧密联结。在赛事筹备与举办过程中,村民们

打破日常分工界限,各展所长:有人负责场地布置,有人组织后勤保障,有人担任裁判等工作。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村民共同参与,极大增强了彼此间的互动与协作,有效优化了乡村社会关系,提升了乡村社会的整合程度。

二、“村BA”对乡村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

组织协调能力的严峻挑战。举办一场“村BA”赛事,涉及赛事策划、赛程安排、场地设施筹备、参赛队伍组织、安全保障、秩序维护等众多复杂环节。以“村BA”为例,比赛期间,不仅要提前规划好比赛场地的灯光、座椅等基础设施,协调各村组建参赛队伍,还要统筹安排安保人员维持现场秩序,调配医疗团队应对突发状况。同时,面对大量涌入的观众,当地还需做好交通疏导、食宿保障、网络信号维护等工作。在“村BA”总决赛期间,台盘村联合公安、交通、卫健等多个部门,通过设立临时停车场、增派交通引导员、开通医疗绿色通道等举措,保障赛事顺利进行。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疏漏,都可能影响赛事正常开展,甚至引发安全事故等不良后果。这对乡村基层组织的统筹规划、资源调配以及部门协同合作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考验着乡村治理主体在复杂事务中的有序管理水平。

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现实检验。“村BA”强大的吸引力,使得大量观众和参与者汇聚乡村,包括本村村民、周边群众及慕名而来的游客,这对乡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形成巨大压力。在基础设施方面,乡村交通能否承载

大量人流,停车场地是否充足;住宿方面,民宿等接待能力能否满足游客需求;餐饮方面,如何保障食品安全与供应多样性;医疗卫生方面,能否及时处理赛事中的伤病情况等。这些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直接关系到赛事参与者的体验,也直观反映乡村社会治理中公共资源配置与服务供给的能力高低。

文化引领与价值塑造能力的深度考量。“村BA”表面上是乡村体育赛事,实则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导向。乡村治理主体需借助这一平台,将团结协作、拼搏进取、公平竞争等体育精神融入乡村文化建设,引导村民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同时,要警惕赛事过度商业化、娱乐化倾向,坚守其扎根乡土、服务村民的本质,这要求乡村治理者具备敏锐的文化洞察力与价值引领能力,在多元文化冲击的时代背景下,挖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契合乡村发展需求的文化氛围与价值体系。

三、拓宽乡村社会治理创新路径

构建多元协同治理新格局。“村BA”发展需突破政府单一主导模式,构建政府、村委会、社会组织、企业与村民等多元协同治理格局。院坝会作为基层民主协商形式,可成为多元共治的沟通桥梁:政府通过院坝会传达政策、倾听建议;村委会围绕赛事组织与村民议事方案;篮球协会等社会组织分享策划思路、收集文化需求;企业公开赞助进展、探讨双赢路径;村民作为核心参与者,可表达对赛事决策、组织监督的看法及场地建设等需

求。多元主体通过院坝会平台沟通协作,既能整合资源,又能让治理决策贴合乡村实际,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推进公共服务供给精准化、智能化。为满足“村BA”等乡村大型活动对公共服务的需求,需着力提升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性与智能化水平。精准化方面,运用大数据分析、实地调研等手段,提前掌握赛事参与人数、来源地、需求偏好等信息,针对性规划交通疏导、住宿餐饮供应、医疗急救资源配置等方案。智能化方面,借助互联网技术开发乡村旅游与赛事服务APP,提供赛事信息查询、住宿餐饮预订、交通导航、紧急求助等功能;加强乡村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建设智能停车场、智慧安防系统等,全面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

深化乡村文化建设与品牌建设。以“村BA”为核心,强化乡村文化建设与品牌建设。一方面,深入挖掘“村BA”蕴含的文化内涵,将体育文化与乡村特色文化有机融合,通过举办文化展览、民俗表演、体育文化讲座等活动,丰富赛事文化内涵,提升村民与游客文化体验。另一方面,加强品牌营销与推广,利用新媒体平台、赛事直播、网红打卡等方式,扩大品牌影响力,吸引更多关注与资源。通过品牌建设,提升乡村知名度与美誉度,推动乡村文化旅游等产业发展,实现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

“五育并举”赋能高校优良学风培育的路径分析

□ 赵效鹏 贺新怡

在新时代教育改革浪潮中,“五育并举”(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成为高校育人的重要方向,也为高校优良学风培育带来了新的契机与挑战。学风,作为高校精神风貌的直观体现,深刻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态度、综合素质以及未来发展。当前,高校学风建设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一些不足,如学生学习动力缺乏、学术不端行为偶有发生、综合素质有待提升等。

一、构建多元协同育人机制,凝聚学风建设合力

高校学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育人主体共同参与。高校党政干部和团干部在学风建设中发挥着引领和推动作用,他们从宏观层面制定政策、规划方向,为学风建设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专任教师作为教学工作的直接实施者,其教学水平与态度直接影响学风建设。提升教学质量、创新教学方法,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辅导员在学生日常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给予针对性的指导与帮助。

学生骨干作为优秀代表,能起到榜样示范作用,带动身边同学积极向上。学生家长是学生的第一任老师,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合作,可形成家校共育的良好局面。校外育人资源如企业、社会机构等,能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和多元化的教育资源,拓宽学生视野。通过凝聚各方力量,构建学风建设共同体,形

成协同育人、合力育人的制度安排与环境氛围,为学风建设提供坚实的主体保障。

二、促进“五育”深度融合,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五育并举”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在学风建设中,要充分发挥其育人优势,将其转化为学风建设优势。

德育立魂,通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主题班会、社会实践等活动,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发学习动力。智育立心,高校应优化课程体系,加强实践教学,推动科研训练,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让学生夯实学术根基,提升认知能力。体育立身,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如运动会、体育比赛等,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增强身体素质、砥砺意志品质。美育立情,借助艺术课程、文化活动等,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培养审美能力和创造力。劳育立品,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劳动实践课程、志愿服务等方式,让学生在劳动中塑造健全品格、创造人生价值,培养劳动观念和实践能力。高校要积极发挥教学、管理、服务、实践、活动、网络等工作平台的作用,构建学风建设能力培养机制,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三、实施“四个课堂”联动,贯穿学风建设全程

“五育并举”追求学校教育的整体价值实

现,是课程育人、文化育人、实践育人、网络育人的整体体现。学风建设要充分践行“五育并举”的立体化育人理念,大力实施“四个课堂”联动育人。

立足“第一课堂”课程育人阵地,优化课程设置,提高教学质量,让学生获取系统知识和技能。在学风建设中,要充分利用育人空间,开展文化活动、社团活动等,丰富学生课余生活,培养学生兴趣爱好和综合素质。打造“第三课堂”实践育人平台,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强化“第四课堂”网络育人功能,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在线教学、学术交流等活动,拓宽学生学习渠道。

积极构建课内课外一体育人、校内校外协同育人、线上线下联动育人学风建设机制,将大学生学风建设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贯穿办学理念、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评估、体制机制和队伍建设全过程,贯穿党建团建、入学教育、文明离校等大学生成长成才全过程,打造动态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学风建设实效。

四、探索学风建设新路径,打造特色品牌。为有效培育优良学风,高校需探索新路径。强化德育引领,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学风建设全过程,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学习动力和责任感。提升智育水平,优化课程体系、加强实践教学、推动科研训练,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和科研能力,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重视体育与

美育,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和美育活动,增强学生体质,提高审美素养。加强劳动教育,将其纳入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劳动实践课程、志愿服务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和实践能力。促进协同育人,加强教师队伍与管理队伍沟通合作,完善部门协同育人机制,促进校内外资源有效整合和联动。

同时,将探索出的路径和策略转化为具体的品牌建设方案,包括品牌标识设计、品牌理念传播、品牌活动开展等,制定详细实施计划,明确时间节点、责任分工和考核标准,确保品牌建设工作顺利推进。通过定期评估品牌建设效果,包括学生综合素质提升、学风建设成效等方面,要对实施过程进行总结,及时调整优化策略,确保品牌建设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五育并举”视域下高校优良学风培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高校从多个方面综合施策。在今后的工作中,高校应进一步加强对“五育并举”的学习和研究,将其贯穿于学风建设全过程。同时,不断探索和创新学风建设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加强协同育人,打造具有特色的学风建设品牌,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西安明德理工学院;本文系2024年度西安明德理工学院校级教学管理研究项目《“五育并举”视域下高校优良学风培育路径研究》(项目编号:JG2024YB16(Z))研究成果。】

数字化浪潮正深刻重塑着公共文化服务的形态与内涵,技术创新不仅打破了时空藩篱,更在深层次上重构了文化资源的供给模式、传播路径和体验方式,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传统的“单向输送”向“双向互动”“沉浸共创”跃迁。

在服务模式的系统性革新中,数字化首先解构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将文化服务延伸至云端。如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图书馆以“多渠道发布、多终端访问”为原则,构建“云端资源+实体空间”联动模式,线上自建特色文献库并引入云图有声、掌阅精选等资源,线下则设置虚拟现实(VR)技术体验区、电子瀑布流等数字阅读场景,使阅读服务突破场馆围墙,实现“全天候覆盖”。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则更进一步,通过“悦生活·星沙文旅云”等四大平台搭建“云上·悦悦”智慧网络,以“悦读、悦艺、悦动、悦悦、悦游”五大主题整合资源,使较欠发达地区居民足不出户即可参与艺术培训、文化讲座,注册用户超33万人。这种全域化数字覆盖,标志着公共文化服务从“场所驱动”转向“场景驱动”。

技术赋能下的沉浸式体验,成为激活文化基因的新引擎。中国电信在甘肃省博物馆应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技术打造数字云展平台,游客通过AR眼镜与文物实时互动,实现“与历史对话”的虚实共生体验。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文化馆的“工匠工坊”数字互动厅则创新推出“数字古琴”,融合实体琴台与虚拟教学功能,使零基础市民也能弹奏古曲,成为线下文化空间的网红打卡点。此类实践表明,数字技术不是冰冷工具,而是通过情景还原、交互设计,让文化遗产在参与中“活起来”,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当代生命力。

供需关系的精准化匹配,则是数字化带来的深层变革。大数据分析使文化服务从“政府配菜”迈向“群众点单”。上海“文化云”平台汇聚全市500余个场馆信息,一年推送超12万场活动,其积累的用户行为数据清晰地揭示了区域偏好差异:浦东亲子活动火爆,松江沪剧一票难求。山东省威海市据此开设古诗词鉴赏、八段锦等特色课程,实现“资源点单化、品质丰富化”。更显著的是,全国公共文化云平台通过“赶大集”“学才艺”等功能模块,将“村晚”从区域联欢升级为全国性品牌,总浏览量达1.4亿人次。这种需求驱动的服务模式,本质是以数据为桥,弥合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鸿沟。

在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层面,数字化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利器。赤峰市在农村牧区推广“空中书屋”,数字电视书屋,将传统草原书屋升级为“24小时在线文化驿站”,注册用户达3.2万人,实现从“村村有书屋”到“人人有书屋”的跨越。同时,中国电信在江苏省徐州市沛县魏城镇民俗馆部署AI互动屏,触摸展示系统,通过实物与虚拟场景结合,让运河文化“可触可感”,助力乡村文化振兴。这些案例证明,数字化并非城市的专属特权,更能在乡土深处扎根,为精神共富提供技术托举。

当前,转型之路仍面临着多重挑战。知识产权保护是核心议题之一:图书馆文献数字化常陷入侵权争议,如果公共图书馆因向读者提供馆藏图书在线阅读,被法院判定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文创产品开发中的“山寨”现象也屡见不鲜,“博物文创”商标侵权案警示着肆意攀附的法律风险。此外,技术应用深度不足、老年群体数字鸿沟、数据安全管理等问题,均需制度与技术的协同破局。北京高院已探索分类施策——对构成作品的文物数据适用著作权法,非作品数据则援引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这类司法实践为行业提供了重要指引。展望未来,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进程将沿着“智能孪生”与“价值升维”双轨深化。

一方面,元宇宙、AI大模型等技术将催生更高级别的文化应用场景。可联合高校人工智能团队与非遗传人,开发戏曲、曲艺类数字人,运用AI大模型训练其掌握地方方言唱腔、身段动作,打造“数字传承人”,在文旅节、线上平台进行展演。同时,构建数字人与观众的实时交互系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实现剧目讲解、文化知识问答。如浙江越剧数字人融合自然语言处理与知识图谱技术,实现经典剧目演绎与观众互动。

另一方面,服务的本质将进一步回归“以人为本”。可开发“文化服务智能匹配APP”,整合地方非遗活动、艺术展览、文化讲座等资源,用户通过填写兴趣标签、地理位置等信息,系统自动推送适合的活动;针对老年群体,增设语音导航与简化版界面,方便其参与文化活动。如海曙区“星海曙光”平台通过志愿活动智能匹配,师资源向农村倾斜,彰显地方特色文化与数字载体的有机融合。数字浪潮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创新,归根结底是以技术为舟、以人文为桨的航行。

当图书馆的典籍化为指尖流淌的数据,当“村晚”的锣鼓响彻云端,当历史文物在虚拟空间中“复活”,文化惠民的内涵正被重新书写,这既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成熟的标志,更是文化强国建设中,科技与人文共舞的壮阔诗篇。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以数字技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创新转型的思考

□ 吴文森